

Higher Education Weekly 大學周刊

2011年5月10日 周二出版 第513期 编辑部电话：010-82614599 电子信箱：dxzkzbx@163.com daxue@stimes.cn

网络公开课：没有围墙的大学

□本报记者 陆琦



- “如果我们的学生在校内逃课，反过来到网上去淘课，我们在表示欣慰的同时——毕竟他们是在学习——更需要反思：我们的教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 “网络公开课让更多的青年学子能在虚拟的大学课堂上获取新的知识，将成为传统课堂的延伸和补充，也是对原有教学模式的一种改进。”
- “一定要体现大学自身的特色，先别管受众喜不喜欢，把自己的特色课程呈现出来。”
- “我们也可以将大学教授塑造成为传播高深学问的‘明星’。”

身处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只要打开一台与互联网相连的电脑，你就可以随时随地聆听世界顶尖大学、知名教授的课程，不用花钱，甚至连注册都不用。

10年前，这还近似一个乌托邦理想。200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率先拉开了网络公开课的序幕。随着耶鲁、哈佛、剑桥、牛津等世界名校以及财力雄厚的基金会的陆续加入，全球的开放课程运动一发而不可收。

目前在美国已经有20多所大学加入这个行列；在欧洲，2006年开始启动英国开放大学的“开放学习”计划等3个公开教育资源实践项目；在日本，已经有16所大学公开了部分课程，其中包括东京大学、北海道大学等著名高校。此外，阿富汗、澳大利亚、奥地利、巴西、加拿大……也都不同程度地推出了相应的开放式课程，它们有的是拿出本校最拿手的课程，有的是将图书馆的一些资源开放。

2011年4月，人们终于在这场公开课的盛宴中看到了中国大学呈现的特色菜品——复旦大学联合门户网站在国内率先推出网络公开课。

据教育部透露，“十二五”期间，我国将有数百所高校加盟，上千名教师参与，数千万门课程或知识模块开放，将有数亿人次从这种教育资源开放中受益。

对此，专家们纷纷拍手叫好：高高在上的象牙塔正在卸下门锁，拆掉围墙，这是教学史上继远程函授之后又一令人激动的创举。

从“逃课”到“淘课”

“以前爱逃课，现在爱淘课。”网络公开课使无数自修者在浮躁的网络社会产生了对优秀教育资源的渴望。

记者对自己的同学、朋友进行了随机调查，有的喜欢耶鲁的《死亡》、《博弈论》，有的喜欢哈佛的《幸福》……大部分希望通过网络公开课练习英语、补充专业知识，也有少部分是想去开拓思维和眼界、活络一下脑筋。

“我个人很喜欢网络公开课。”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郭英剑教授也是“淘课”一族，他告诉记者，只要有时间就会经常看，而且还会把新的课程推荐给朋友和学生看。

“一方面学习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比如法律、历史等领域的课程，希望拓展知识面；另一方面关注与自己专业相关的文学领域，主要学习他们的教学思想、对问题的当代阐释以及教学方法。”一聊到网络公开课，郭英剑就打开了话匣子。

郭英剑认为，目前的网络公开课之所以受欢迎，主要有三大原因。

第一，所有公开课都来自世界名校，这是

吸引人们关注的重要因素。这就是“名校效应”。

第二，所有公开课的讲授者都是所在大学的知名教授、大牌教授甚至“明星”教授，他们的课堂教学思路开阔、内容与时代契合、对经典内容的阐释彰显了当代意识，教学方法也非常得当。在流行文化盛行的全球化时代，这样的人能够吸引人们的注意，自然是在情理之中。

第三，无论是法学、经济学、社会学还是文学领域，都有极为吸引人的课程。而这些内容也是当今大学生正在学习和白领阶层关注的，吸引他们去“淘课”就不奇怪了。

“如果我们的学生在校内逃课，反过来到网上去淘课，我们在表示欣慰的同时——毕竟他们是在学习——更需要反思：我们的教学究竟出了什么问题。”郭英剑认为，在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同时，大学应该思考如何让青年学子自觉地留在自己喜爱的课堂里。

首先，反省我们当下的教育理念。应该说，我们的教育理念和思路都还有落后于时代的地方。

其次，深刻反思我们当下的教育手段。不能否认，我们还有很多教师，包括中青年教师，还无法适应甚至拒绝用当下先进的技术手段来辅助教学；与此同时，一些教师则过分依赖技术手段，忘记了更重要的是课程内容。

“网络公开课让所有人眼见为实地‘触摸’到了世界名校的水平。这就让我们在看到自身差距的同时，也看到了他们并非高不可攀。”郭英剑相信，中国大学只要不断学习、不断努力，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不过是时间问题。

将大学搬回家

所谓网络公开课，就是高等院校将教学课程、讲座录像、教学大纲、课堂笔记等做成视频，上传到互联网上，免费分享该资源。只要不求学历和学位，这种方式能让即便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家中就能享受到名校、名教授的课程，还能让在校大学生选择对自己最有用的课程。

这种模式被网友们称为：将大学搬回家。

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元培学院副院长卢晓东教授认为，网络公开课是大学传播知识的一种很好形式，对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知识升级以及民众的文化水平提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网络时代以前，大众的中等教育基础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所以在大学传授高深学问的时候，无论是受众的知识基础还是媒介条件都不具备。只有在两个必备条件建立之后，网络公开课这一新兴事物才能够得以发展。”卢晓东说，“美国之所以在这方面比

我国领先，原因就在于其民众知识基础和条件的领先。”

作为网络公开课的忠实“粉丝”，郭英剑发现，目前的网络公开课大都是一些以讲授为主或者讲座式的大课堂教学，即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回答问题为辅的课堂教学，这与传统的课堂授课没有大的不同，与课堂内容、听课对象无太大的关系。

郭英剑同时指出，网络公开课与“百家讲坛”有所不同，“前者毕竟是一门课，而后者则是一个话题”。话题可以深入浅出，甚至旁征博引，只要能让人听得开心就行，但课程就要深入得多，有特定的教学目标。

卢晓东也表示，“百家讲坛”的受众是所有电视机前的老百姓，所以其课程内容会根据受众的不同进行调整。而网络公开课的课程就是大学课程，其直接听众就是大学生。“网络公开课代表了知识前沿和高深学问，‘百家讲坛’则不是。”

在郭英剑看来，名校网络公开课风靡全球，至少带来了三个改变：第一，从规模上看，极大地改变了传统课堂教学范围狭小的教育模式。不管教室有多大，学生有多少，在网络公开课面前，它都是狭小的，一堂公开课可以有成百万上千万的人们观看。第二，从影响力上看，既打通了全球高校之间的联络，也使高等教育走出了校门和国门，已经或者正在逐步影响着不能进入高校或者不能进入名校的人们，并且也在改变着在校大学生以及所有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方式。第三，从体制上看，将进一步推动世界高等教育的改革，不仅是教育观念，还有教学思路和教学方式。

中国大学：2011年推20~50门试点

在国外名校课程火爆网络的同时，人们不禁要问中国名校的网络公开课在哪里？

4月1日，复旦大学的网络公开课率先粉墨登场，立刻赢得一片热烈掌声。

“复旦在国内领先一步，却没有看到北大、清华的身影，这确实非常遗憾。”卢晓东感叹道。

据复旦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方明介绍，复旦近期筹资实施的“人文振兴计划”，其中专门有1500万元用于国际学术交流，校方将在全球遴选一流的人文学者，邀请他们来作短期访问。每位学者要作4~5场公开讲座，学校将把这部分讲座的视频制作成网络公开课免费向社会开放。

方明还透露，复旦平均每年还有超过2000场各类讲座，资源非常丰富。“过去5年来，我们也积累了大约500场讲座的视频，计划从中陆续选择一部分公开上网，与社会共享。”

紧随其后，在西安交通大学建校115周年之际，西安交通大学网络公开课也正式对外发布。

西安交通大学网络公开课是在西安交通大学学术资源平台的基础上，经过5年的积累和沉淀建成的，录制发布包括该校创新论坛、学而讲坛、曲江论坛在内的高水平学术讲座2000场，学术视频1900余小时，讲座内容涉及法学、理学、教育学、医学、工学、历史学、文学、哲学等八大学科。

记者了解到，不少大学也已开始投入网络公开课的开发，并已进入倒计时状态。4月初，浙江大学已经开会研究了关于网络公开课的启动，计划在9月前，将学校一些精品课程打造为网络公开课，实现完全开放，同时配有中英文对照的字幕。

为了规范并促进视频公开课的建设和发展，教育部高教司还专门成立了“视频公开课建设工作专家组”。

浙江大学本科学院副院长、教研处处长陆国栋教授是该专家组负责人，他介绍，今年会在“985工程”高校和若干特色高校中进行试点。试点课程有两种版本，分别是18分钟和30分钟的精华版或压缩版。“把最能够吸引人的、能够互动的、能够引起兴趣的内容展现出来。”

陆国栋表示，网络公开课不完全等同于大学里的一堂课，课程是重新设计过的，会兼顾学生和大众两种需求。当然，其中学生的需求是首位的。

“具体的课程还在规划过程中。”陆国栋透露，中华传统文化和高薪技术是两个重要主题。今年先推出20~50门，“十二五”期间可能达到500门。

至于资金，陆国栋表示还在预算过程中，主要是政府投入，学校会有部分投入，当然也希望有社会资金的投入。“估计10学时的一门课大概20万元左右。”

“网络公开课让更多的青年学子能在虚拟的大学课堂上获取新的知识，将成为传统课堂教学的延伸和补充，也是对原有教学模式的一种改进。”陆国栋希望中国的网络公开课能够走出自己的一条路。

给上课师生带来压力

从具体制作来看，网络公开课对于软硬件方面的要求不算太高。

“网络公开课在技术上应该已经没有任何困难。”卢晓东指出，教授确定课程主题，

文科生为何就业难？

打小，孩子们就被教育“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现实也证实了这一点。从近年来的就业率看，一直呈现工科生最高、文科生最低的局面。

文科生为什么会在就业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呢？

原因不外乎以下几个：一是社会对文科毕业生总体需求不足；二是许多文科专业性较弱，可替代性强，理工科的就业岗位文科生做不了，而文科生能做的不少岗位理工科毕业生同样可以适应；三是随着高校扩招，教学成本相对较低的文科专业招生增幅较大，加剧了文科类就业岗位的竞争；还有就是女性占多数的文科生在就业时往往遭遇性别歧视。

不只是在我国，理工科人才在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都更受青睐。原因在于，理工科生就业后对于社会的作用往往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其工作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可以直观地表现出来并予以量化。而文科毕业生的传统使命是管理社会、传承文化与价值、塑造时代精神，尽管他们的作用也不可或缺，但其作用却很难被量化，因此文科毕业生的出路明显受到限制。

文科专业多数靠近精神层面，只有在第三产业发达的情况下才会繁荣起来。我国人口基数大，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源很丰富，因此文科毕业生就业出路相对较窄的情况在短期内将无法有较大改观。

我们不能只是一味地要求大学生尽人事、听天命。各个高校也要反思自身存在的问题，在社会现实需求和学校培养现状严重脱节的情况下，对自己的学科设置重新作出科学、合理的规划。（陆琦）

中国大学评论

政府的归政府 大学的归大学

□李金波 包万平

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之际，2011大学校长全球峰会暨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第15届校长年会举行，来自五大洲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130多年大学的校长齐聚清华园，热议“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中外大学校长们讨论最激烈的就是“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缺的是什么”。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从总体上看，我国高等教育还不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的要求，同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明显差距”。那么，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缺的是什么？我们的差距到底在哪里？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有的人认为中国大学缺对科研、教学的卓越追求，有的人认为中国大学缺全球化视野，也有人认为缺宽松环境与平和心态。在笔者看来，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什么都缺，缺钱、缺物、缺人才、缺精神、缺文化、缺态度……但最缺的还是与世界一流大学对接的管理体制。

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的一流大学都是在自由的氛围和宽松的环境里生成的，大学享有广泛的办学自主权，政府与大学有着非常清晰的界限，政府不会随随便便对大学发号施令，即便是政府对大学提出一些要求，也要看大学的教师和学生答不答应，大学绝不会随政府的指挥棒而动。而我们则不同，政府一方面高喊遵循教育规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另一方面却强化行政管理、向大学发号施令。就在清华校庆典礼之后，教育部就第一时间发出了红头文件《关于教育战线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的通知》，向全国各高校提出了“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要求。当然，总书记的讲话是非常值得学习的，各个大学也有自己的学习安排，但似乎并不需要专门发一个红头文件号召大家集体行动。

现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用红头文件来管理高校的做法越来越成为了习惯性态势。一份接一份的红头文件如雪片般飞来，让大学应接不暇。就笔者供职的大学，一个月就能收到来自教育部、教委的红头文件达60份之多，有要求政治学习的，有要求上报材料的，有要求接受检查的。就这样在行政部门无微不至的红头文件“关怀”下，大学的行政化极为膨胀，大学的负重也越来越重，能够落实的办学自主权越来越少，我国的高校逐渐丧失了办学的活力与自由，人才培养趋同严重，千校一面，我们的大学也就这样“管死了”。纵观世界，如此管理大学的少之又少。难怪像钱学森说的那样，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杰出人才“冒”出来，大学的办学水平不见增长，应该说这与行政部门的管理有很大的关系。

按理说，大学是独立的学术机构，有着自己的办学逻辑和发展规律，用不着行政部门指手画脚，这一点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办学历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一些享誉世界的高水平大学是按照“探索—创新”的方式发展起来的，世界一流大学是内部客观力量积累的产物，包括政府在内的外界力量无法进行任何形式的控制和干预，政府也没有理由对大学有任何形式的目标设想和价值定位。我们的大学则恰恰相反，由政府一手主导。应该说，政府行政管理介入高校，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大学发展的自身规律，严重伤害了大学的学术自主性。比如20世纪50年代实施的全国院系大调整一度让大学变得“支离破碎”，90年代的高校合并使一些大学的历史渊源被人切割。另如，在不具备相应条件的情况下，推进大学规模扩张所引发的学校资源短缺、教学质量难以控制、学生就业难等问题，在很长的时间内无法得到科学的解决。这些都是大学不能自主、政府一手包办造成的后果，这样的教训实在太多了。

有人总结说，大学自主权是大学的最后一道防线，如果连这道防线也没有了，就不能成为大学。诚然，尽快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是建设一流大学的关键，而解决这一问题的第一道难题就是行政部门的管理。所以，建议划清教育部、教育厅等部门与大学的界限，让政府的归政府，让大学的归大学。因为大学本质上是一个研究高深学问的学术组织，布鲁贝儿说：“既然高深学问需要超出一般的、复杂的甚至是神秘的知识，那么，自然只有学者能够深刻地理解它的复杂性。因而，在知识问题上应该让专家单独解决这一领域中的问题。”大学是一个学术自治团体，故而大学的事情应由大学做主，由教授做主，由学生做主。政府应该远离大学，而不应该与大学纠缠在一起，对大学由谁组织、谁管理、谁评价等基本问题有个彻底的断。有人会说，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与大学隔离以后，教育部、教育厅等做什么？笔者以为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是通过发布情报信息、批准规章制度等手段对整个教育提供指导与服务的机构；是争取国家各部委支持，为教育的发展提供宽松环境的保障机构。所以教育部等部门主要以负责整体教育资源协调、基础教育发展等为宜，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事情最好交予第三方机构如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等负责，大学内部的事情由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负责，保障学者、学生参与学校决策的权力。或许只有这样，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才不再是梦想。

主 编 崔雪芹 本版责编 陆琦